

辛亥革命在贵州

肖先治 欧多恒 主编
冯祖貽 顾大全



贵州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在贵州

陈永发、陈永明 主编

陈永发、陈永明 主编

陈永发、陈永明 主编

上 篇

贵州辛亥革命史

冯祖貽 顾大全 著

责任编辑 叶光大

封面设计 石俊生

辛亥革命在贵州

肖先治 欧多恒 主编
冯祖贻 顾大全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地矿局测绘大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400千字 23幅插图

印数 1—150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1-02800-1/K.156 定价:8.00元

繼承辛亥革命
精神振興中華！

張玉琢
一九二九年
二月

继承革命光荣
传统奋发图强
兴贵州

秦天真

一九九二年二月



图为参加贵州省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与会代表合影。

自治學社章程

第一章名稱及宗旨

一、本社名曰自治學社，個人自治地方自治，國家自治，皆為其宗旨。凡我同胞，如有志於此者，請即加入。本社宗旨，在於研究個人自治，定個人自治為最要，期人人有道德，智慧，養成良善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贊助地方自治，實行國家自治之希望。

第二章社員

一、凡與本社宗旨相同者，無論何人有本社社員一人之紹介，經評議部認可，皆得為本社社員。
 二、本社社員，有自認能維持本社經費者，本社可推為維持員。
 三、凡與本社宗旨相同者，雖未入社，而能實力贊助本社者，本社可推為贊成員。

自治學社社員名表

姓名	號	年齡	籍貫	出身
張鴻儒	斯誠	三十八	興義府	法政教員
張自麟	景編	二十九	長沙	法政學員
王元藩	小谷	四十	安南縣	法政教員
鍾振玉	子俊	三十一	貴州	法政學生
甘應成	德文	同上	興義府	同上
黃開源	飛天	三十四	同上	同上
謝正鈞	子衡	三十	興義府	同上
謝人瑞	石松	同上	安南縣	同上

西南日報

WEST-SOUTH
DAILY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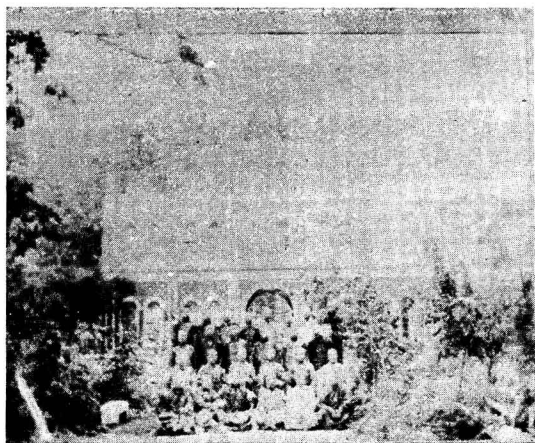
自治學社
集誌



贵州军政府枢密院院长张百麟与主要成员合影。从左至右第一排第三人戴戡，第五人张百麟，第八人黄德铤，第九人黄泽霖，第二排第三人周培艺。



1912年冬，唐继尧与当时贵阳名流在“光复楼”前合影。中着戎装者为唐继尧。从左至右，第一排第三人周沅，第五人唐尔镛，第六人凌秋鹑；第二排第二人黄齐生，第三人张协陆；第三排第三人张彭年；第四排第三人黄干夫。



唐继尧、刘显世与官绅合影

目 录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贵州	(1)
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1)
二、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15)
三、新的社会力量与新思潮兴起	(23)
第二章 团体、派别与斗争	(38)
一、科学会、同盟会贵州分会和历史研究会	(38)
二、张百麟与自治学社	(47)
三、宪政预备会	(63)
四、封建官绅与地方团练	(67)
五、1910年前的“两党斗争”	(70)
第三章 贵州辛亥革命爆发	(79)
一、自治学社转向革命	(79)
二、各种革命力量的聚集	(86)
三、宪政预备会的复杂表现与清政府垂死挣扎	(95)
四、贵州军政府的成立与全省光复	(99)
第四章 贵州军政府的内外政策	(112)
一、“南北议和”中的正确立场	(112)
二、援川和北伐	(115)

三、民族政策·····	(117)
四、革新与除弊·····	(118)
第五章 革命走向失败 ·····	(122)
一、革命派由主动转为被动·····	(122)
二、反动势力的步步进逼·····	(130)
三、“二·二”事变·····	(137)
第六章 滇军人黔与贵州军政府的颠覆 ·····	(141)
一、宪政派、耆老会与地方团练向云南乞兵 ···	(141)
二、云南军政府的“假途灭虞”·····	(147)
三、贵州军政府的颠覆·····	(151)
第七章 贵州军阀统治的开始 ·····	(157)
一、反动势力的疯狂报复·····	(157)
二、革命派的“驱唐”斗争与袁世凯祸黔·····	(162)
三、冤愤团与二次革命·····	(171)
四、唐继尧出兵四川镇压起义·····	(178)
五、贵州军阀统治的开始·····	(184)
第八章 贵州与护国战争 ·····	(190)
一、刘显世统治的建立与贵州护国起义·····	(190)
二、护国战争中的黔军·····	(209)
三、贵州人民反袁支前斗争·····	(223)
结束语 ·····	(228)

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的贵州

一、社会矛盾的尖锐化

爆发于 1911 年(清宣统三年)的辛亥革命,与以往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起义、革命不同,它是一次在比较完全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爆发在 20 世纪初年,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贵州,这场革命的根源同样深植于贵州各族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矛盾之中。

自 1840 年(清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后,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贵州与祖国其它各省区一样,逐步地从封建社会跌入更为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贵州境内的各族人民向来具有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光荣传统,自进入近代社会之日起,他们从未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贵州各族人民发动了声势巨大、延续近二十年的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成为全国革命高潮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义和团运动失败,清政府进一步投降卖国,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瓜分豆剖”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一个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同盟会,领导全国人民发动了新的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贵州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

外国殖民主义势力入侵贵州,不只从鸦片战争才开始,据现有材料来看,早在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作为外国殖

民主义先遣队的传教士即来贵州活动。公元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法国传教士穆勒勒从四川正式到贵州务川、思南进行传教活动;过了三年,便有传教士进入贵州绘制地图。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法国教士罗方济又来贵州务川、毛田、思南一带传教,此后,罗一共四次潜入贵州,活动于黔东北一带,罗又派教徒到遵义、贵阳进行传教活动。通过半个世纪教会的渗入,到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1年),“贵州传习天主教,各乡聚集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省城之北门外尤甚。”^①可见教会势力发展之快。但是,这时天主教的传入是非法的,清政府不止一次下令禁止,罗方济本人即被贵州地方官拘留审问过,贵州地方当局也不止一次饬令对传习者“严密查拿”,“按律严惩”。

如果说,鸦片战争前,传教士窜入贵州还不得不用非法的、偷偷摸摸的形式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58年(清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外国侵略者获得进入内地自由传教权后,他们便大摇大摆地涌入。至清末,贵州已是“教堂林立,每因争讼细故而起,教案逐日滋多”^②,宗教势力已深入贵州各府县。传教士中不乏有为传播教义而献身的职业宗教人士,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却是借传教为名,在贵州广泛收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的侵略分子。如法国教士范恩利自1879年(光绪五年)来贵阳后,便以宗教职业为掩护,伙同另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周忠臣,几十年如一日地绘制贵州地图,他们足迹远到遵义、镇宁和关岭,广泛收集矿产、气象情报,源源不断寄回法国^③。法国一个殖民主义机构在1895年至1897年(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间曾派员到中国搞间谍活动,回国后写下这样的报导: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五四,第19页。

② 《贵州通志·前事志》四十二,第25页。

③ 贵州省天主教爱国会编:《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贵州的侵略活动》第10页。

“……最铭刻于心的，是在贵州小住贵阳北堂时，传教士们对我们的殷勤招待。我们因工作需要，曾三次到过那里，除了对这些应该向他们表示感恩外，尤其可贵的，是从那里我们得到有关贵州的地形、民族、物产等大量的宝贵资料。”^①这就如实招供了贵州天主教堂在帝国主义侵略贵州过程中的罪恶行径。

传教士们特别注重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开展他们的侵略活动，他们与当地封建土司相勾结，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制造民族纠纷，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②。各地教堂凭借着帝国主义作靠山，在各地霸占各族人民的土地、房屋，征收高额田租、私设牢房。在他们卵翼下，地主、团首、地痞流氓纷纷入教，与传教士勾结一起，为非作歹，欺压民众，终于挑起一次又一次闻名中外的教案。

贵州的各次教案中，以 1861 年（咸丰十一年）的青岩教案、1862 年（清同治元年）的开州教案和 1862 年（同治元年）的遵义教案影响较大。这三次教案虽然都由传教士及教民的“肆行无忌”^③所引起，但在清政府投降媚外的反动政策指导下，结果都是以人民的被镇压，清政府地方官吏的遣戍、斥革和大量的赔款而告结束。公元 1884 年（光绪十年）遵义再次发生教案，仅赔款给教会一项，即达三十万两之巨。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在全国惩办“护教不力”的官吏，贵州思南知府张济辉、龙泉县知县继文就以保护教堂“奉行不力”被“开缺离省”^④。自此以后，贵州的教会、教民更加横行霸

① 贵州省天主教爱国会编，《贵州天主教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 7 页。

② 如威宁石门坎教堂地基即由当地土司安某所捐（一说以手枪换得）。见钟煥然，《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各少数民族皈依基督五十周年史》未刊稿。

③ 当时贵州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给全省官吏的公函上有这样一句话，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六，第 43 页。

④ 《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 4693 页。

道,教民犯法,只要传教士一张名片,地方官便释放了事,教堂成了“独立王国”,传教士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仁怀传教士范若瑟便是代表^①。贵州省档案馆藏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范若瑟给当时遵义知府袁玉锡的信,信中公然指控仁怀知县“肆行苛政,擅竖妒教之阶”,原因是没的按照他的意旨办理七件民教冲突案(实际上是教民欺压群众)。这个传教士要求袁玉锡必须按他信中所提出办法处理,如不应允,“贵府幸勿启嫌,不日将禀领事”。此事惊动了贵州巡抚林绍年,林明知范若瑟的专横行径干预了地方行政,“有违和约”,但还是不敢得罪这位洋大人,赶紧命令袁玉锡迅速处理案件,“毋稍延宕”^②。为什么一个个的传教士竟敢这样横行无忌?这还不是清政府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奉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的结果吗!范若瑟的信,给我们留下了帝国主义侵略者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欺压贵州人民的罪证,同时也是清政府屈辱投降的一份可耻记录。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志士陈天华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初,清政府已经彻头彻尾地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各级地方官吏不过是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守土官长”^③,贵州也不例外。

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向来是他们实行经济掠夺的前锋。随着外国教会的深入贵州各地,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如水银泻地,倾销到贵州各个角落。

19世纪60年代末叶,外国商品开始小批流入贵州,但因交通不便,洋货既少且贵,对整个贵州经济影响不大。19世纪70年至90年代,由于通商口岸的扩大,关税权的落入外国侵略者

① 范若瑟的种种罪恶还可参见《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在贵州的侵略活动》第15页。

② 贵州省档案馆藏件,全宗2,卷号333。

③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第36页。

手中，外国商品便象潮水般涌进中国，偏僻的贵州逐渐沦为外国侵略者倾销商品的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外国资本家向贵州倾销的商品中，以棉纱最为大宗。1896年至1897年（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英国布莱克本商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在贵州各地区，“安顺对洋纱需要量甚大而且在不断增长，每年进口的价值大大超过其他输入品的总值”，“估计安顺府每年出售的进口棉纱约在三千包至四千包之间，而且是求过于供。”^① 黄草坝（兴义）“每年在该地共销售有每包重四百磅的一千包”，这些棉纱都来自香港，即所谓的“印度纱”，是通过北海和南宁，运到西江的百色改交驮运，运到兴义的。这份报告称这里“印度纱完全排斥了汉口和广西的棉花，不仅因其价廉而且便于织造”。^② 由于洋纱（主要是印度纱和日本纱）在贵州大量倾销，贵州的手工纺纱业遭到沉重打击，殖民主义商人在调查中得意地宣称：印度纱的输入在黄草坝“土纱业中引起了一个革命，跟着就完全排斥了手纺土纱，今日差不多走到任何一家农户，都可以看到，过去曾为不可少的纺车都摆在一边，布满着灰尘被遗弃了。”类似的现象在贵阳、安顺、兴仁等地都在发生。如贵阳“城内织机……都是用进口的棉纱织的”。安顺每周产布几千匹，大多是用“孟买和日本棉纱”。而新城（即兴仁）“价廉而便宜的孟买纱厂的生产产品完全排除了用本地棉花纺成的土纱”，全城3000张布机，“过去是从汉口和广西输入大量棉花的，而现在唯一的原料就是印度纱，不论经线和纬线都同样用印度纱绞成。”^③ 少数民族地区，如荔波的水族，原是“家家种棉，户户织布”的，但洋纱输入后，也改用洋纱作经线，代替了一半土纱。

①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214、248页。

② 同上书，第214页。

③ 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248—250页。